

美国对当代菲律宾媒体文化的影响： 机制与挑战*

马宇晨

摘要：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媒体援助是其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广受学界关注。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后，菲律宾媒介市场发生较大变化。美国以此为契机，加大对菲律宾的媒体援助，提供运营资金、人才培养和舆论塑造等方面支持。部分获得美国资助的新闻机构成为当代菲律宾媒体运营典范，对菲律宾新闻伦理、社会文化发展趋势和新闻生产流程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对菲律宾媒体的文化影响，既是其对外文化传播的缩影，也为如何在社交媒体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时代进行跨文化交流提供启示。

关键词：媒体援助 菲律宾 媒体文化交流 新闻报道

对外文化援助是国与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大量实施对外文化援助，在全球范围内构筑起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媒体援助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我国前辈学人围绕美国对外媒体援助已展开诸多研究。部分学者从非政府组织的视角，将媒体援助纳入对广义的发展援助的研究中。^①更多成果见于对东欧和中亚具体国别媒体的研究中，梳理了美国媒体援助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16）阶段性成果。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① 参见白建才、张建斌《我国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研究述评》，《经济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4期；刘赛、石岚《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亚的活动与角色》，《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6期；戴锋宁《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浅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导致的传媒转型及其社会影响。^①上述研究为分析美国媒体援助提供多种视角,但研究视野尚未覆盖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

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被美国视为对外文化战略的“试验田”,各类对外文化援助往往率先在菲律宾实施。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著述颇丰^②,一方面清晰描绘了美菲文化交流的生动景象,另一方面为分析美国对外文化援助的历史渊源和整体脉络提供诸多启示。然而,相关研究更多关注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形式,尚未对当代美菲文化交流,尤其两国在媒介体系等制度文化层面的互动给予充分重视。因此,研究美国对当代菲律宾媒体援助,不仅能够填补美国对外媒体援助在国别层面的空白,亦能进一步丰富美菲文化交流的图景,加深学界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理解。

菲律宾的媒介体系发端于美国殖民时期,在新闻理念、规制体系等方面深受美国媒介体系影响。菲律宾媒体是其社会组成部分,参与塑造社会舆论,能够在社会事件中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菲律宾媒体市场发生较大变化,美国也实施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媒体援助,并持续至今。本文聚焦当代菲律宾社会为背景,梳理1986年以来美国对菲律宾媒体援助的运行机制,通过深入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个别

① 参见赵永华《中亚转型国家的新闻体制与媒介发展》,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赵永华、邓耀敏《来自中亚国家的传媒转型经验:哈萨克斯坦媒介生态观察》,《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5期;张玉川、陈力丹:《哈萨克斯坦新闻传播业的曲折发展》,《当代传播》2021年第6期;张霞《美国在中亚实施的独立媒体项目》,《国际展望》2012年第3期。

② Maria Guillen Acierto, *American Influence in Shaping Philippine Secondary Educatio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98-1978*,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1980; Doreen G Fernandez, "Philippine-American Cultural Interaction", *Crossroad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 No.1, 1983; John A. Lent, "Philippine Media and Nation-Building: An Overview", *Gazette*, Vol.16, No.1, 1970, pp.2-12; Reynaldo Clemeña Iletto, *Knowledge and Pacification: On the U.S. Conquest and the Writing of Philippine History*,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2017; Sharon Delmendo, *The Star-Entangled Banner: One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 in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2005; Hazel M. McPerson, *Mixed Bl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Colonial Experience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Quezon City: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2011; 施雪琴、王晗:《20世纪初期菲律宾留美学生项目探析》,《暨南史学》2019年第2期,第277—296页。

媒体机构，厘清美国援助对菲律宾媒介体系的影响，思考媒体跨文化交流的特点。

一、美国媒体援助的历史背景： 菲律宾媒介体系的发展与特征

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制定了一系列殖民政策，将美国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以及教育制度移植至菲律宾。同一时期，商业媒介体系也作为殖民地改造方案的一部分引入菲律宾。大批美国人在菲律宾创办商业刊物，引入广播技术，成为菲律宾现代媒介体系的开端。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罗哈斯政府效仿美国，建立以商业媒体为主的媒介体系。媒体成为代表民众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Fourth Estate）和“看门狗”（watchdog），与立法、司法和行政拥有相似的重要性，被称为“亚洲最自由的媒体”。^①

20世纪60年代末，菲律宾媒介体系经过二十余年发展，逐渐呈现出私有化、集团化和家族化特征，21家全国性日报和245家广播电台中的大部分为私人所有，18家电视台中仅1家为国有。围绕《马尼拉纪事报》《马尼拉时报》《菲律宾先驱报》以及《晚间新闻》（*Evening News*）形成四个大型媒介集团，囊括全国约90%的报刊、广播台和电视台，几乎垄断菲律宾媒介市场。^②上述媒介集团分别被洛佩兹家族（Lopez）、索里亚诺家族（Soriano）、埃利萨尔德（Elizalde）家族以及罗塞斯（Roces）家族掌控，媒体言论受所有者影响，被用于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1972年9月，菲律宾先后成立菲律宾印刷委员会（Philippine Council for Print Media）和广播媒体委员会（Broadcast Media

① John A. Lent, "The Press of the Philippines: Its History and Problems",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43, No.4, 1966.

② Crispin C. Maslog, *Philippine Communication Today*,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2007.

Council), 加强对媒体报道的审查和约束。马科斯政府仅批准《每日快讯》(Daily Express)、《时代日报》(Times Journal)、《今日公报》(Bulletin Today) 以及《晚间邮报》(Evening Post) 等亲政府商业媒体运营。1981年, 马科斯解除军管法, 放松媒体管制, 部分反对政府的另类媒体^①出现, 主流媒体中也逐渐出现批评政府的消息。由小布尔戈斯(Jose Burgos Jr.) 和阿波斯托(Eugenia “Eggie” Apostol) 等资深媒体从业者出资建立的《自由报》(Malaya)、《先生和女士》(Mr. and Mrs.)、《问询者周刊》(The Weekly Inquirer)、《真理》(Veritas) 等另类媒体以此为契机逐渐崛起。上述媒体逐渐占领当时的菲律宾媒体市场, 挤压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 频繁揭露马科斯政府经济治理失序和腐败状况, 为1986年的社会变革积蓄了势能。^②

阿基诺夫人执政后, 重新恢复宽松的媒介规制政策, 放开对媒体各项限制, 大量商业媒体迅速涌现。此前的另类媒体在资金压力下很快关停或被收购, 仅《自由报》和《每日问询者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前身为《问询者周刊》) 继续运营, 一度成为新的主流媒体。1987年, 新政府颁布修订后的《宪法》, 恢复了菲律宾民众组织结社的权利, 增设鼓励建立和推动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条款。非政府组织深度参与各行业发展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 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等机构的推动下, 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在数量、规模和范围上激增, 仅1986年后的十年内就增加了160%, 达到70200个。^③在菲律宾政局重新洗牌、媒体市场百废待兴、非政府组织影响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美国开始了对菲律宾的媒体援助。

① “另类”一词译自“alternative”, 意为非主流、非传统的。相比于主流商业媒体和官方媒体, 另类媒体通常由小型的非政府组织建立, 发行量较少, 受众更为单一。另类媒体以其批判性、多元化和独立性著称, 通常发表与主流媒体不同的观点, 为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发声。

② 参见林理介、尹韵公《菲律宾新闻事业概况》, 《国际新闻界》1986年第4期。

③ 参见施雪琴《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及其原因》, 《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 杨超《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 《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7期。

二、美国对菲媒体援助运行机制： 主体、目标与方式

美国媒体援助指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媒体提供的资金等方面支持。实施媒体援助的机构和部分学者认为，媒体援助能够提高受援国媒体的质量和独立性，增强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功能。^①也有不同观点指出，媒体援助可能成为援助者扩大影响力的手段，会损害受援助国家媒体多样性和自主性。^②美国对菲律宾实施媒体援助的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广播理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等，直接提供资金、技术、培训等形式的支持，同时也通过自己运营或资助的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向菲律宾传播美国的声音和立场。

半官方机构：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美国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美国非洲基金会（The Africa-America Institute）等由美国政府资助或授权成立的机构，主要从事民主促进和人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其中也包括对媒体的支持和帮助。

① Eduardo González Cauhapé-Cazaux, Shanthi Kalathil,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 Media: Figures and Finding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 2015; Krishna Kumar,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o Promote Independent Media in Transition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 *Democratization*, Vol.13, No.4, 2006.

② Daire Higgins, "The Western Way: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Assistance Model", 2015; 霍淑红、张惠玲：《媒体援助、非政府组织与美国霸权的构建——对美国私人基金会媒体援助的实践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James Miller, "Ngos and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Media: Situating Media Assistanc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5, No.1, 2009; Michael J Barker, "Democracy or Polyarchy? US-Funded Media Development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Post 9/11",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30, No.1, 2008.

非政府组织：包括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奥米迪亚基金会（Omidyar Network）、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等由私人或企业资助或创立的非营利组织，主要从事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等方面工作，也包括向媒体提供贷款或投资。

美国对菲律宾媒体援助的总体目标是构建活跃、独立、专业、批判性的另类媒体，为菲律宾社会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和观点，促进菲律宾的民主化和信息自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网站中列出对菲律宾媒体援助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

监督与制衡政府和权力：通过调查报道和评论文章等方式，揭露政府腐败和丑闻，监督政府行为和决策，制衡政府对滥用权力。

代表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通过报道、专题、访谈等方式，关注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为边缘群体利益发声，维护其权利和尊严。

提供和传播多元化观点：通过新闻、分析、评论等方式，提供和传播与主流媒体不同或相反的信息和观点，反映社会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促进社会舆论的多元化。

推动民主进程：通过倡导、动员、组织等方式，推动和参与社会变革，支持社会运动和公民行动，促进社会公正和民主化。^①

媒体援助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形式，狭义的媒体援助指向特定媒体机构提供运营资金。广义的媒体援助还包括提供人才培养、技术支持、推动对象国媒体改革及舆论支持等。本文采用广义的媒体援助概念，关注美国对菲律宾媒体在资金、人才以及舆论方面的支持，并将由此引发的对菲律宾新闻伦理、媒体发展趋势以及对新闻生产的影响纳入考察范围：

^①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warded Grants Search",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06-06-2022, <https://www.ned.org/wp-content/themes/ned/search/grant-search.php?organizationName=®ion=&projectCountry=Philippines&amount=&fromDate=&toDate=&projectFocus%5B%5D=Freedom+of+Information&search=&maxCount=25&orderBy=Year&start=1&sbmt=1>.

（一）运营资助

资金支持是最常见的援助方式。1986年之后，一批另类媒体依靠美国的媒体援助成立，成为菲律宾另类媒体中较为成功的代表。虽然此类媒体声称依靠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以此保持机构的独立性，但通过对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可见，来自美国的媒体援助是这些另类媒体维持运营的重要因素。

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Philippine Center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是较早获得美国媒体援助的另类媒体。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官网显示，其资金主要源于机构捐款、个人捐款以及销售出版物所获收入。该机构对外宣称能够凭多元化收入来源实现财务独立，不会受到媒体所有者和广告商的影响，“只需对董事会及其读者负责”^①。然而，私人捐赠的数额多为每人每年3000至10000比索，总额相对较少，需依靠大量机构捐款方可维持该机构的运营。^②成立初期，九位创始人各自出资1000比索，在不领取工资的前提下，仅能勉强维持运营。一年后，亚洲基金会成为其首个资助方。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获得资助后，开始雇佣专职办公室经理，并为记者提供调查资金。其后，福特基金会也捐赠一笔种子基金，每年的利息收益用于支持中心的日常运作。^③在两家境外基金会的资助下，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在一众另类媒体中脱颖

①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 “Donor Profil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Assistance, 2023, <https://www.cima.ned.org/donor-profiles/national-endowment-democracy/>.

② Menelito Mansueto, “The 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PCIJ) and ABS-CBN through the Prisms of Herman and Chomsky’s ‘Propaganda Model’: Duterte’s Tirade against Media and Vice Versa”, *Social Ethics Society-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4, No.3, December Special Issue, 2018,

③ The Asia Founda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Veteran Filipino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Sheila Coronel”, The Asia Foundation, 28-05-2014, <https://asiafoundation.org/2014/05/28/a-conversation-with-veteran-filipino-investigative-journalist-sheila-coronel/>; PCIJ, “Support the PCIJ”, PCIJ, 2022, <https://old.pcij.org/patron/>; Sheila S. Coronel, “Why Foreign Funding of Philippines Media Isn’t the Problem”,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 03-05-2019, <https://gijn.org/2019/05/03/why-foreign-funding-of-philippines-media-isnt-the-problem/>.

而出，能够定期发布刊物，并出版大量学术著作，逐渐成为在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地区广受赞誉的媒体机构。

拉普勒（Rappler）建立于2012年，是近年来菲律宾另类媒体中的成功范例。根据拉普勒公司财务报表，2012年至2014年间该公司经营收入由2287万比索逐年上升至1.39亿比索，但始终处于亏损状态。三年中，拉普勒每年均需要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向菲律宾国内企业融资，以维持企业运营。2015年，拉普勒向北基传媒（North Base Media）和奥米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发行存托凭证，融资近400万美元，为公司经营带来转机。三笔资金的注入使拉普勒在2015年的筹资金额超过1.7亿比索，约为2014年度拉普勒经营活动亏损的6.5倍，期末剩余现金及等价物余额相比2014年增长10倍。

表1 拉普勒2012—2015年财务状况

年份	经营收入 （比索）	经营活动亏损 （比索）	筹资金额 （比索）	期末现金及等价物余额 （比索）
2012	22,872,093	23,691,192	60,271,782	10,310,642
2013	57,550,754	71,491,937	81,512,593	11,840,563
2014	116,062,189	25,955,774	39,050,000	8,320,201
2015	139,461,654	35,194,194	170,537,668	96,508,317

资料来源为拉普勒年度财报：Rappler Inc. *Rappler Financial Statement-Annual(2012)*,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2013. Print; *Rappler Financial Statement-Annual(2013)*, 2014. Print; *Rappler Financial Statement-Annual(2014)*, 2015. Print; *Rappler Financial Statement-Annual(2015)*, 2016. Print.

2017年，奥米迪亚将存托凭证无偿捐赠给14位菲律宾籍员工，在未获得任何回报的情况下退出投资。此后，拉普勒从媒体发展投资基金（Medi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und）处再次获得资助。该基金创

办于1995年，由索罗斯（George Soros）投资，总部位于纽约，专注于向“自由和独立媒体受威胁的国家”中的独立媒体提供融资服务，联合创始人萨夏·武契尼奇（Saša Vučinić）也是北基传媒的创始人之一。2019年起，媒体发展投资基金成为拉普勒新的资助方，每年通过“媒体融资”项目向拉普勒发放15万美元贷款。^①

（二）人才培养

美国媒体援助不仅面向媒体机构，也对媒体从业者开放。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通过设立各类文化交流和新闻学奖学金，加强发展中国家记者与美国媒体界和文化界交流，培养其对美国价值观和新闻制度的认同。美国高校和非政府组织打造“旋转门”制度，资助发展中国家记者对本国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性报道，并为其提供国际行业协会或高校职位，借此打造覆盖全球的新闻人才网络。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和拉普勒的创始人克罗内尔（Sheila Coronel）和雷萨（Maria Ressa）均受益于该人才培养体系，成为近二十年菲律宾乃至东南亚地区较为著名的新闻记者。

克罗内尔的职业生涯始于军管法晚期，后加入《马尼拉时报》，担任政治记者。1989年，克罗内尔与其他8名菲律宾记者共同组建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2000年，该机构发表一系列关于埃斯特拉达腐败的调查报道，为反对派发动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提供重要依据。2006年，克罗内尔前往美国，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担任调查新闻中心主任，并于2014年升任新闻学院院长。在学术工作之外，克罗内尔也深度参与媒体行业协会，曾担任国际调查记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董事会主席，现任媒体发展投资基金（Medi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und）董事会主席、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① Rigoberto Tiglao, “Rappler Continues to Spit on Our Constitution”, The Manila Times, 01-12-2021,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1/12/01/opinion/columns/rappler-continues-to-spit-on-our-constitution/1824291>.

Journalism Review) 和非营利媒体“为人民”(ProPublica)的董事会成员。杜特尔特执政后,克罗内尔重新聚焦菲律宾,撰写多篇抨击禁毒行动的文章,发表专著《杜特尔特读本》(A Duterte Reader),斥责杜特尔特所引导的民粹主义对民主和新闻自由构成威胁。^①

雷萨1963年出生于菲律宾,10岁时随母亲移民美国新泽西州,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英语学士学位。1986年大学毕业后,雷萨获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资助,回到菲律宾大学学习政治戏剧,教授数门新闻学课程。1987年,雷萨从菲律宾大学毕业,开始记者生涯,曾短暂地在菲律宾国家电视台第4频道(PTV-4)工作。1988年至2003年,雷萨也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以下简称“CNN”)工作,历任马尼拉分社和雅加达分社社长,逐渐成长为CNN的亚洲首席调查报道记者。在此期间,雷萨先后领导了CNN对1998年印尼政变、1999年东帝汶独立以及2001年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的深度报道。“9·11”事件后,雷萨将关注重点转向东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并将关于东南亚地区恐怖组织发展情况的调查报道结集成册,发表《恐怖的种子》和《从本·拉登到脸书》两本著作。2004年至2010年,雷萨出任ABS-CBN高级副总裁,负责新闻及时事部门。离职后,雷萨于2011年创立拉普勒,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及主编。拉普勒是菲律宾首个使用视频、文本、音频和照片等在线多媒体的新闻网站,也是菲律宾第一个全数字新闻机构,在成立后发展迅速,于一年半内迅速攀升成为菲律宾访问量仅次于《每日问询者报》和ABS-CBN的新闻网站。^②

(三) 舆论支持

美国对媒体援助也包括舆论支持,具体表现为西方媒体的对特定

^① “Sheila Coronel”, 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 <https://journalism.columbia.edu/faculty/sheila-coronel>.

^② CNN, “Maria Ressa”, CNN, 2005, https://edition.cnn.com/CNN/anchors_reporters/ressa.maria.html; Rappler, “Rappler Is Ph’s 3rd Top News Site- Alexa”, Rappler, 06-09-2013, <https://www.rappler.com/nation/38290-rappler-third-top-news-site-alexa/>.

媒体及其报道的大力宣传，国际新闻行业协会为特定新闻记者颁发各类奖项。通过舆论支持，美国在菲律宾塑造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另类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加强其报道菲律宾国内政治影响力。

2016年后，拉普勒和雷萨专注于对菲律宾社会问题的报道，知名度上升，多个国际组织先后为雷萨颁发奖项，表彰其为推进菲律宾新闻自由、打击虚假信息做出的贡献。201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下属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为雷萨颁发年度民主奖，表彰其对杜特尔特将操纵社交媒体的报道，是雷萨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2018年至2019年雷萨先后获得国际新闻学会、保护记者委员会、世界报纸和出版商协会、美国国际记者中心和斯坦福大学等机构颁发的新闻类奖项。随着国际知名度的攀升，雷萨逐渐成为菲律宾乃至全球新闻界代表人物。2021年10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向雷萨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使雷萨的国际关注度达到顶峰。

三、媒体援助的现实影响： 新闻伦理、发展趋势与政治作用

人民力量革命后，菲律宾媒体市场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军管法时期主流媒体几乎全部关停，为其他媒体的增长留出空间。另一方面，普通读者的政治热情逐渐趋于平淡，对政治类报道内容的兴趣有所减弱，另类媒体的生存处于挣扎境地。美国通过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和舆论支持的方式在菲律宾支持一批另类媒体崛起，对菲律宾的新闻伦理产生一定影响，改变了另类媒体的发展趋势，使媒体在菲律宾政治中的作用愈发复杂。

（一）推进调查性报道在菲律宾发展

调查性报道起源于美国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

Movement)^①, 1970年代随《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复兴, 成为美国新闻伦理的重要潮流之一^②。此前,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记者在进行报道时遵循客观性原则, 避免个人经历、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主观偏见对新闻采集、加工、传送过程的影响, 新闻的主要目的是客观地向读者报道“事实”(fact), 由受众通过新闻报道中的客观事实了解“真相”(truth)^③。然而, 随着政治与社会环境日趋复杂, 仅报道“事实”愈发难以帮助受众了解“真相”, 不断改变的受众使真相变化无常的特性在当代成为更复杂的问题。^④接受美国援助的菲律宾另类媒体不仅参与写作调查性报道, 更强调其自身对菲律宾新闻伦理的引领作用, 将推行调查性报道在菲律宾传播作为工作目标。

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除发布调查报道外, 也为东南亚其他媒体记者、新闻专业教师和学生组织培训研讨会, 向调查记者提供报道和出版资金。成立十年后, PCIJ在菲律宾主要报纸和杂志上发表180余篇文章, 制作五部纪录片, 出版十余本书籍, 在菲律宾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媒体自由与责任中心(Center for Media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与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建立于同一时期, 定位更偏向于媒体倡导组织。该机构专注于新闻行业的自我评估和自我监管, 旨在通过改进菲律宾媒体行业的报道伦理, 提升媒体从业者的专业性和责任感。该中心定期出版《菲律宾新闻评论》(Philippine Journalism Review), 监测各主要媒体的表现和可信度。媒体自由与责任中心设置“王彬新闻奖”, 鼓励菲律宾新闻从业者践行调查性报道。1989年至2001年, CMFR为

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进入镀金时代的美国问题重重, 其中最核心也最严重的就是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腐败。美国新闻界展开了暴露丑闻、揭露不良企业内幕以及名人丑事的广泛报道, 史称“扒粪运动”, 即黑幕揭发运动。“扒粪运动”到了中后期, 作品中充斥着煽情和不负责任的报道, 揭黑幕的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 又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大量报道煽情的内容, 受到各界批评。

② 参见陈海波《后“社会责任论”时代美国新闻伦理的演进》, 《东南传播》2016年第2期。

③ 参见侯迎忠、赵志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初探》, 《当代传播》2003年第04期。

④ 参见〔美〕菲利普·帕特森、〔美〕李·威尔金斯《媒介伦理学: 问题与案例》(第8版), 李青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PCIJ的19篇报道颁发该奖项，奠定PCIJ作为菲律宾另类媒体典范的基础，共同推进调查性报道在菲律宾发展。

表2 1989—2001年PCIJ获王彬奖情况一览

获奖作品	作者	奖项	年份
《艾滋病威胁》	Ceres P. Doyo	二等奖	1989
《土地改革》	Sheila S. Coronel	三等奖	1989
《菲律宾电影和电视审查》	Constantino Tejero	一等奖	1990
《困难时期：对拉莫斯总统的挑战》	Sheila S. Coronel 等6人	一等奖	1992
《总统的塑造：1992》	Sheila S. Coronel	二等奖	1992
《众议院的商业利益：国会议员违反利益冲突规则》	Eric Gutierrez	一等奖	1993
《迷上纳布啡：可控止痛药引诱宿务瘾君子》	Eileen Mangubat、Marites Sison-Paez	二等奖	1993
《绿色进化：十字路口的环保运动》	Yasmin Arquiza	三等奖	1993
《化学巨头逃避对致命产品的禁令》	Howie G. Severino	一等奖	1994
《花档赌博在拉莫斯中心地带蓬勃发展》	PCIJ 与大众民主研究所	二等奖	1995
《从灾难中获利》	Chay Florentino-Hofileña	三等奖	1996
《出价最高者的公正》	Sheila S. Coronel	一等奖	1997
《上帝自己的装配线》	Claire Tielens	二等奖	1997
《骗局之母》	Sheila S. Coronel	一等奖	1998
《高达65%的教科书资金用于贿赂》	Yvonne T. Chua	一等奖	1999
《百年世博会：选举筹款的便利封面》	Chay Florentino- Hofileña、 Ian Sayson	二等奖	1999
《埃斯特拉达能解释他的财富吗？》 系列报道	Yvonne T. Chua、Sheila S. Coronel、Vinia M. Datinguinoo	一等奖	2000
《亲信争夺埃斯特拉达的克拉克赌场》	Marites Dañguilan-Vitug、 Glenda Gloria	三等奖	2000
《GSIS 保险垄断：永无止境的骗局》	Sheila Samonte-Pesayco	二等奖	2001

（二）导致另类媒体的“主流化”发展趋势

马科斯执政末期，主流媒体报道失衡，政治氛围动荡，菲律宾民众加关心政治报道，另类媒体能够依靠读者的订阅费生存。政局平稳后，大量商业媒体涌现，民众对政治报道的兴趣降低，另类媒体的市场份额大幅减少，无法从读者订阅中获得足够收入。与此同时，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等受美国援助的新型另类媒体也参与到竞争中。最终，大部分军管法末期成立的媒体由于缺乏运营资金，被迫停刊或被收购，菲律宾的另类媒体呈现出“主流化”发展趋势。

菲律宾热点新闻社（Philippine News and Features，以下简称热点新闻社）是一家建立于1984年的左翼新闻社，着重报道地方层面的土地改革、侵犯人权和生态环境问题。1986年后，热点新闻社一度超过了官方的菲律宾新闻社（Philippine News Agency），成为最受欢迎的主流新闻社之一。该社最初由左翼团体资助建立，其后的运营经费主要来自向商业媒体出售新闻的收入。随着阿基诺夫人政府政策转向，该社所提供的新闻报道不再受主流媒体青睐，销售收入锐减，加之来自左翼团体的资助日益缩减，最终被迫停止运营。另一家左翼媒体《平日》（Midweek）也由于缺乏资金最终停刊。该报由一批菲律宾艺术家于“人民力量革命”前数月建立，以中产阶级、讲英语的知识分子为目标受众，对“人民力量革命”后主流媒体向精英和寡头家族倾斜的报道议程采取批判态度。由于缺乏资金，《平日》无法进入报刊分销体系，因此销量难以与商业媒体竞争。^①

通过对比1990年代不同另类媒体的经营状况可见，外部资助是20世纪末以来另类媒体维持运营的决定性因素，提供资助的机构由此获得影响另类媒体的力量。以亚洲基金会为例，该机构成立于1954年，前身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成立的自由亚洲委员会（Committee of

^① Desmond Smith,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Leeds Thesis, 1996.

Free Asia), 是美国在菲律宾推行教育、文化以及传媒等多领域心理宣传活动的重要机构。^①福特基金会也是美国政府长期合作伙伴, 双方合作巩固美国的文化霸权, 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冷战”结束后, 两个基金会继续参与政府共同承担实施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角色。^②人民力量革命后, 左翼另类媒体由于资金和人才匮乏最终关停, 社会关注的议题长期被忽视, 经济自由化负面影响等报道逐渐淡出媒体市场。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等接受美国援助的媒体取而代之, 将报道视野集中在打击政府腐败、性别平等和保护人权等议题, 使菲律宾另类媒体呈现出“主流化”发展趋势。

(三) “媒体矩阵”影响新闻生产全流程

除直接发布新闻报道的媒体之外, 美国对菲律宾媒体援助也参与到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 如新闻教育、职业培训和评价标准等。受资助的媒体共同组成“媒体矩阵”, 对菲律宾新闻生产全流程产生重要影响。

2017年至2021年期间,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拉普勒共计提供资助78.6万美元。同一时期,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以“促进信息自由”为理由向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CMFR、维拉档案以及棉兰老新闻学院(Mindanao Institute for Journalism)等媒体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资助总额达1674万比索。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资助项目的描述, 受

-
- ① 参见张杨《亚洲基金会: 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2期; 许卓《冷战初期美国在菲律宾心理宣传活动探究——以亚洲基金会的“民主种子”项目为例》, 《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 景丽娜、唐小松《中央情报局对亚洲基金会的干预及影响》, 《情报杂志》2022年第3期。
- ② 关于两个基金会更详细的研究, 参见戴锋宁《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浅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第113—124页; V. Bulmer-Thomas, *Empire in Retrea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Issa G. Shivji, “The Silences in the Ngo Discourse: The Role and Future of Ngos in Africa”, *Africa Avelopment*, Vol.31, No.4, 2006, pp.22—51; Pawel Zaleski, *Global Non-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Geosociology of the Third Sector*, London: IFIS Publishers, 2006; James Petra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A Documented Case of Philanthropic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ecret Police”, *Rebellion*, 2022, <http://www.rebellion.org/hemeroteca/petras/english/ford010102.htm>。

资助的5个组织分别承担如下功能^①：

拉普勒：专注于收集和分析有关虚假信息生态系统的数据，以促进对虚假信息如何在网上传播以及这种动态如何影响民主的研究；与其他新闻组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合作，使合作事实核查系统化和扩大，并支持旨在扩大虚假信息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菲律宾调查性新闻中心：专注于编写关于民主和权利问题的调查报告，定期组织公共论坛；深化对报告主题的讨论，并开展培训，以提高记者对人权、民主治理和有罪不罚相关政策的理解，提高他们对此类问题撰写调查报道的技能。

媒体自由与责任中心：负责监测媒体报道实践，提高行业对侵犯媒体自由行为的认识；出版审查新闻状况的年度报告，举行以新闻专业主义为题的会议。

维拉档案：将监测、核实和报告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所作声明的准确性，在其网站上公布“无党派”的评估结果；在传统和社会媒体上推广这些文章，以提高公众意识，促进更明智的政治讨论。

棉兰老新闻学院：作为一个可靠的独立新闻报道来源，报道菲律宾南部地区的关键和未充分报道的问题，包括和平进程、治理、商业和环境；深入地研究地方和国家一级的政策对该地区社区的影响。

表3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际开发署对菲律宾另类媒体资助情况一览

机构名称	年份	美元（元）	比索（百万）
拉普勒	2017—2021	786,000	40.9
媒体自由与责任中心	2009—2021	971,600	50.5
维拉档案	2016—2021	430,600	22.4
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	2010—2021	771,943	40.1

①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warded Grants Search”,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06-06-2022, <https://www.ned.org/wp-content/themes/ned/search/grant-search.php?organizationName=®ion=&projectCountry=Philippines&amount=&fromDate=&toDate=&projectFocus%5B%5D=Freedom+of+Information&search=&maxCount=25&orderBy=Year&start=1&sbmt=1>.

续表

机构名称	年份	美元（元）	比索（百万）
棉兰老新闻学院	2017—2021	259,149	13.5
总计		3,219,292	167.4

资料来源：Rigoberto Tiglao, “US-Funded Media Firms Here Campaigning for Robredo”, The Manila Times, 25-03-2022,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2/03/25/opinion/columns/us-funded-media-firms-here-campaigning-for-robredo/1837555?utm_campaign=magnet&utm_source=article_page&utm_medium=related_articles.

“媒体矩阵”报道关于菲律宾社会的“事实”，并试图以此向菲律宾公众揭示、传播关于菲律宾社会的“真相”，扮演了关注、质疑菲律宾社会问题的角色。该矩阵囊括菲律宾新闻生产全流程，包括但不限于新闻生产、技能培训、标准制定以及事实核查功能，不仅通过媒体生产“真相”，还通过行业协会影响“真相”的生产过程与生产标准，试图通过事实核查掌握定义信息与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权力，间接影响“真相”的生产。换言之，该“媒体矩阵”试图影响菲律宾的新闻伦理，规定新闻界应当基于何种“事实”、使用何种方法产生关于菲律宾的何种“真相”。

四、美国媒体援助面临民粹主义挑战

2021年10月，雷萨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国际舆论对雷萨大加赞誉，拉普勒的国际声誉迅速上升。然而，拉普勒新闻报道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影响力却呈逐渐下降趋势。在杜特尔特6年任期内，以拉普勒为代表的另类媒体始终采取与政府对抗的策略，负面报道的主题包括“禁毒战争”违反人道主义、雇佣网络水军传播虚假新闻、家族和政党成员涉嫌腐败以及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新闻媒体等，但并未得到菲律宾民众的广泛认同。2022年6月30日，杜特尔特完成其6年任期，正式卸任。多家民调机构的数据均显示，杜特尔特成为1986年后离任

时民众满意度最高的总统。^①与此同时，路透社的民调显示，拉普勒已成为最不受信任的菲律宾媒体。^②曾经深受菲律宾民众信任的另类媒体正在逐渐面临信任危机，另类媒体的报道对民众的动员能力愈发减弱。

民粹主义思潮兴起与媒体面临信任危机是近年来菲律宾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一体两面，自2016年其逐渐发酵，于2022年大选中得到充分展现。2016年大选中，小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竞选副总统，得票率达34.47%，仅以微弱的劣势败于自由党候选人罗布雷多。2022年大选竞选期间，菲律宾另类媒体不断指控小马科斯家族的非法所得、未缴纳遗产税以及青年时期学历造假，以人民力量叙事为核心对小马科斯进行负面报道。尽管如此，小马科斯依靠社交媒体动员选民，始终名列各类民调结果之首，以绝对优势领先主要竞争对手罗布雷多。最终选举结果显示，小马科斯获得了58.77%的得票率和3160万张选票，成为1986年后得票率和得票数最高的总统。他的竞选搭档、杜特尔特之女莎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获得了61.53%的得票率和3220万张选票，成为1986年后得票数最高的公职候选人。

民粹主义思潮的崛起源于民众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当主流媒体讨论通胀、就业和经济发展时，长期主政地方的杜特尔特将毒品、犯罪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与底层民众息息相关的问题纳入政纲，在社交媒体上与民众频繁互动，既是其引导民粹主义思潮的手段，也是对民众需求的切实关注。2022年大选中，小马科斯以“团结才能再次崛起”（Sama-sama tayong babangon muli）为竞选标语，将老马科斯执政期间称为“黄金时代”，应合菲律宾民众好对经济发展迟滞的贫富差距

① Kaithreen Cruz, “SWS: Duterte Leaves with ‘Very Good’ Rating”, The Manila Times, 15-07-2022, <https://www.manilatimes.net/2022/07/15/news/national/sws-duterte-leaves-with-very-good-rating/1850913>; Mark Ernest Famatigan, “Duterte Gets 69% Trust Rating: Publicus Asia”, Yahoo News, 29-06-2022, <https://ph.news.yahoo.com/duterte-gets-69-trust-rating-pub-li-cus-asia-064627735.html>.

② Yvonne T. Chua, “2022 Digital News Report-Philippines”,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15 June 2022,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digital-news-report/2022/philippines>.

扩大的不满。选举结束后，为马科斯家族“正名”的电影《马拉卡南宫里的女仆》（*Maid in Malacañang*）和《烈士还是凶手》（*Martyr or Murderer*）先后上映。两部影片从马科斯家族视角描绘人民力量革命前后的历史，其中《马拉卡南宫里的女仆》票房超7.5亿比索，成为菲律宾电影史上第三高的影片。

媒体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宗旨，与其视野中有碍社会发展的一切障碍进行斗争，将自身塑造为引领社会进步的力量，却始终无法摆脱美国援助的影响。菲律宾另类媒体长期将报道重点集中在腐败、贫困和女性等议题，而忽略了与底层民众生活相关的问题，为当今的信任危机埋下种子。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另类媒体的替代选项，也是传播、容纳、形塑民粹主义思潮的场所。近年来，菲律宾媒体建立各类事实核查机构，企图把握定义“事实”的权力，借调查性报道等专业主义概念，依据拟定好的事实得出“真相”，重塑昔日权威。

结 语

1986年后，菲律宾政府放松媒介管制措施，为媒体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变化提供契机。美国政府、半官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相互配合，以构建批判性另类媒体和增强舆论多样性为宗旨，为菲律宾另类媒体提供运营资金、人才培养和舆论支持。菲律宾部分媒体接受美国援助后迅速成长，成为当代菲律宾另类媒体中成功运营的典范。美国对菲律宾媒体援助推动调查性报道在菲传播，导致菲另类媒体的“主流化”发展趋势，“媒体矩阵”在事实核查、技能培训、新闻生产以及职业道德等多个层面发挥作用，是影响当代菲律宾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0世纪初以来，美国对菲律宾媒体文化的影响由表及里，首先体现在媒介技术、媒体语言、市场格局等表现形式，随后逐渐深入到媒介理念、报道伦理、新闻生产等制度文化层面。美国将菲律宾视为

“试验田”，率先在菲律宾实施各项对外文化战略。因此，美国对菲律宾文化战略所遭遇挑战是其近年来在全球各地困境的缩影。当前，利用传统媒体进行说教式单向文化输出的效果愈发不彰，社交媒体影响力日益增加，成为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形式。社交媒体对广大民众在个性化传播和互动表达方面赋能，但也面临着民粹主义、虚假消息、数据主权等多重挑战，这导致跨文化交流对话在日趋大众化、互动化、平等化、多极化的同时，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这一现象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